

后冷战初期美国国家利益与巴以冲突

王新国¹, 蔡昌卓²

(1.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1; 2. 广西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1)

[摘要] 冷战的结束不期而至, 美国的对手变得难以确定, 其国家利益也难以界定。伴随冷战的结束是苏联的消失, 也使美国的实力相对衰弱。在后冷战初期, 美国在中东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尤其积极介入巴以冲突。无论是巴以和平进程取得进展, 还是出现倒退与反复, 我们都会发现这一切都是由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所决定的, 都是其国家利益的彰显。

[关键词] 后冷战初期; 美国; 国家利益; 巴以冲突

[中图分类号] D51; D815.4;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07)01-0135-06

如果从1929年的“希伯伦事件”算起, 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将近80年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巴以内部派别之争以及大国的角逐, 使中东一直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地区之一。随着冷战的结束, 大国利益关系的调整, 巴以和平进程在大国尤其是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干预下, 虽然取得了像沙龙政府加沙撤离的重大突破, 但未能最终解决。本文试从国家利益的角度, 就后冷战初期即“9.11”以前, 美国与巴以冲突的利害关系及外交实践, 探讨巴以冲突在这一时期取得重大突破而未能最终解决的原因。

何谓“国家利益”? 王逸舟认为: “一般地讲, 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和受益点, 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1] 我个人认为, 国家利益应包括一个国家的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及扩张利益(少数国家)。生存利益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利益, 如国家的领土、资源以及国民的生存权利, 这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变的利益; 发展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在生存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后, 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谋求自身发展的权利并且获益; 所谓国家的扩张利益, 是指一个国家在谋取地区霸权或全球霸权地位的过程中或在取得这种地位后向周边国家或世界所谋求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利益, 是发展利益极端的体现。如美国, “扩张意识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中, 并成为美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鲜明特征”^{[2](p1)}。

而无论哪种国家利益都必须也必然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利益等, 其中政治利益又包括安全利益、军事利益、国防利益等, 经济利益又包括贸易、科技等方面的利益, 文化利益主要涉及宗教、民族、意识形态、价值观等。

“国家利益的界定, 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因素”。决定国家利益的内在因素, “主要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的政体形态”^[1] 那么就美国来说, 美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的特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寻求大量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市场。随着冷战的结束, 两极对抗的消失,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发达的工业、商业及科学技术都需要更为丰富的能源和更为广阔的市场。而巴以冲突所在地中东“是由37个国家、8.5亿人口和190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十分多样化的社会。这些国家控制着世界的绝大部分石油, 拥有许多强大的敌人, 在下一个世纪也将行使其巨大的贸易权利”^{[3](p142)} 中东石油目前探明总储量达895亿吨, 约占全球石油储量的65.7%。“控制中东石油, 不仅是为了满足美国自身的消费需求, 更重要的是控制了中东石油就是控制了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基地, 可以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4](p239-240)} 从这一点来说,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加大干预巴以和谈体现了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从国家的政体形态来看, 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

[收稿日期] 2006-09-28

[作者简介] 王新国(1982-), 男, 江苏丰县人,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蔡昌卓(1962-), 男, 广西资源人,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历史学博士。

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国家,而体现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的制订必然与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对总统的选举、对总统与国会政策的制订有很大影响。美国有犹太人600万,不足总人口的3%,但犹太人在美国成立了许多支持以色列的组织,如“犹太协会”等。“用简单、直截了当的语言来概括:美国已经为以色列做了一个国家可以为另一个国家所做的一切”^{[5](p140)}。但是“支持以色列的组织的成功刺激了美籍阿拉伯人组织的兴起。美籍阿拉伯人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rab Americans)的宗旨就是利用美国的民主程序所提供的空间促进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外交平衡”^{[6](p93)}这也是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与1995年塔巴协议的和平谈判上采取较公正态度的重要原因。国家政体形态中对美国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价值观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自美国建国以来,以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现实主义一起,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主要因素”^[7]。美国一直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推行于世界,“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外交,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文化渗透活动的国家”^{[8](p389)}中东是伊斯兰文化圈,与西方社会文化有冲突,而以色列则不同,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西方文明自由民主社会在中东的“橱窗”,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中过分偏袒以色列。在美国看来,即使伊斯兰国家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其民主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伊斯兰不区分宗教与政治的界限;一个非民主的像当今沙特这样的政权,一个完全的伊斯兰政权注定是较少自由的。^{[9](p216)}带着这种有色眼镜,促使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以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样板,对中东的事情十分敏感并积极参与。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更加注重文化影响的作用,以“实现冷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10]1997年美国《四年防务评论》将推行“人权”、“民主”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这样就使得后冷战时期在中东推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

决定国家利益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决定其国家利益时所要考虑的一切外部因素。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对抗的消失,整个世界在兴奋的同时,也逐渐陷入了一种迷茫。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各国在从冷战的阴影中走出来之后,着手发展本国经济;在国际政治上,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日益形成“一超多强”的格局,但是在一超多强格局形成前的后冷战初期,整个世界呈现的是杂乱无序。美

国的战略界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中,争论的主题是美国在冷战之后的国家利益究竟如何划分,如何确定国家的战略目标,而“国家战略目标所要实现的预期任务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里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战略意图的具体化”^{[11](p41)}由于中东石油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来源地,美国进口的石油有1/3来自中东,因此中东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东依然是美国国家经济、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地区。而在中东获得最大利益的可能性无疑是中东的稳定,而要中东稳定则必须推动巴以和平进程。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生存、发展、扩张的国家利益的内涵来讲,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利益的外延来讲;无论是从决定国家利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的内在因素来讲,还是从决定国家利益所要考虑的一切外部因素来讲,中东在美国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巴以冲突又是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因此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必然要把巴以和平进程提上日程,并“通过海湾战争和战后中东秩序的安排及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确立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建立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地区安全体系”^[12]

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必然要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得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同样如此,“美国在外交活动中所奉行的政策和所采取的活动都可以看成是国家利益的体现,或者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13](p176)}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对双方所造成的伤害都是无法弥补的。后冷战时期,面对美国地位的相对衰弱及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失规制”的时代。所谓失规制(deregulation)是指“规范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那些规制几乎都不为各国普遍接受”^{[14](p22)}可以看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随着冷战后许多突发事件的爆发,美国对这些事件处理的乏力,说明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已相对衰弱了。面对这种新的形势,美国必须调整其传统的中东政策,以符合新形势的需要。

在冷战时期,美国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将其与恐怖主义组织相提并论,对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嗤之以鼻。由于中东“这一地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演变可能对全球繁荣和稳定有重大影响,影响到世界强国美国的利益涉及到的广泛事务”,而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国家利益包括“以色列生存及中东和平进程的完善;对恐怖主义的遏制”^{[15](p103-104)},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1988年12月

16日,美国驻突尼斯大使同巴解组织代表举行首次会晤,打破了美巴长达40多年的对峙僵局,也拉开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序幕。美国在海湾战争前,为了组成反伊拉克的军事同盟,也为了冷战后中东利益的需要,着手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承诺在海湾战争后推动巴以和平进程。1991年3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海湾战争结束不久,便推出了新的中东政策。有关巴以冲突,布什认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消除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分歧”。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美以特殊关系”,因为美国仍然“继续保持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把以色列军事力量作为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威慑力量”。^{[16](p452~456)}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既不再可能有完全的孤立主义,也无力推行过去意义上的全球主义,而是奉行一种比较实际的全球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也就是“有选择地脱离与有选择地承担海外义务”。^{[17](p52~53)}美国为实现其主导下的中东和平,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得不调整其传统的中东政策。同时,由于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对中东依然有所依赖,美国不得不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另外,美籍犹太人内部的分裂也给美国的新中东政策提供了内部空间。在这种情形下,布什政府加大了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步伐,制订了“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中东政策。1991年3月6日,布什在国会提出了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的倡议,希望在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的范围内,贯彻“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建立全面中东和平。为此,美国国务卿贝克自1991年3月上旬至10月中旬8次出访中东,为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而努力。为了使以色列回到谈判桌上来,布什总统以支援以色列100亿美元为条件使以色列同意召开美国主导下的马德里和会。1991年10月30日,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老王宫正式开幕,11月1日会议结束。马德里和会并未就中东和平问题达成一致,而仅仅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幕式”。从1991年11月3日到1993年9月,阿以双方进行了11轮谈判,前五轮由于以色列沙米尔政府的强硬态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布什总统为了加快推动和平进程以在1992年大选中获得连任,拒绝向以色列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而以色列没有这100亿美元使从原苏联来的近20万移民无处安身,这使沙米尔政府在1992年大选中失败,以色列工党领袖拉宾组阁,谈判进入了新的阶段。布什这一政策使其在大选中成为克林顿攻击的目标,为此失去了国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也失去了连任机会。在此期

间,美国国务卿贝克因为负责布什总统的大选工作,在谈判期间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谈判的进程显得被动了许多。马德里和会虽然成效不大,但它毕竟使巴以之间由过去的冲突状态走向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开启了巴以和平进程的大门。

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继续前任政府的中东政策,加大了“西促和谈”的力度,重视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94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是控制石油以稳定的合理价格自由输出,确保以色列及阿拉伯友好国家的安全,继续寻求中东和平进程的全面突破。1995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对中东安全的战略报告》更加强调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为此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从1993年2月到1996年1月,对中东进行了16次专访。1993年4月,美国宣布以“正式伙伴”身份参与和谈;9月13日巴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又称《奥斯陆协议》,原因是该宣言的实质性谈判并不是由美国主导的,而是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秘密达成的。协议达成后,美国为了实现其主导中东事务的目标,维护自己中东和平推动者的形象,最终在华盛顿举行了签字仪式。在签字仪式上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向以色列总理拉宾伸出了和解之手,使巴以和平进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美国在协议签署后推波助澜,不仅恢复与巴解高层的对话,而且让巴解在美国设立办事处。巴以协议的签订使中东热点一再降温,这符合美国联合阿拉伯世界“东遏两伊”的利益。通过奥斯陆协议,美国不仅改善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使中东反美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也使美以关系更上了一层楼。得到美籍犹太利益集团支持的克林顿总统与以色列工党的合作,使美以关系在后冷战时期达到了和谐的程度。

随着1993年巴以《奥斯陆宣言》的发表,中东和平进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94年7月约旦与以色列签署了《华盛顿宣言》;10月26-29日,克林顿首次访问中东,约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约以长达40多年的对峙局面划上了句号。此后,美国又积极倡导举行中东北非首届首脑经济会议,促进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在这种背景下巴以关系继续加强。巴以双方于1995年8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联合声明》。9月28日,克林顿主持了协议签字仪式。

就在巴以在和平轨道上快速前进的时候,支持以“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工党领袖拉宾于1995年11月3日被犹太极端主义分子刺杀,致使和平进程

陷入了瘫痪与反复的境地。继任的佩雷斯工党政府虽然得到了克林顿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在1996年大选中落败了,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上台。内氏一上台便提出“三不”政策,用“以和平换和平”代替“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由于克林顿忙于竞选连任,在中东政策上向以色列倾斜,巴以和平进程在困顿的环境下停滞了近两年之久。1997年克林顿第二任期开始,虽然在中东问题上忙于穿梭外交,但事实证明收效很小。1997年1月双方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其内容较奥斯陆协议的目标相去甚远,巴以和平进程开始倒退。

1998年10月,克林顿与巴以双方领导人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怀伊种植园签署了《怀伊备忘录》,虽然其内容与《奥斯陆协议》和1995年《联合声明》的目标相去甚远,但毕竟使处于瘫痪的巴以和平进程出现了转机。克林顿总统于2月12-15日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区进行访问,目的是推动巴以双方实行《怀伊备忘录》。为了拉拢以色列,重申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不可动摇,并在每年援助以色列的军事、经济3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给12亿美元支持以色列执行该协议。内塔尼亚胡态度强硬,对克林顿访问巴勒斯坦很不满,在执行该协议时处处设置障碍,阻碍巴以和平进程,这引起工党的不满,迫使以色列在1999年5月提前大选,工党领袖巴拉克将军上台。由于1995年后巴以和平进程停滞,巴以双方无论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具体问题上,都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虽然巴拉克总理与阿拉法特均想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但双方互不信任的增加,加上巴拉克有自己的一套和平方案,使前一时期谈判的成果难以相继。美国对持续的巴以僵局渐渐感到疲倦。2000年9月28日,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后,终于使后冷战时期反复无常的巴以和平进程的车轮再也无法向前滚动了。

2000年是大选年。新当选的总统小布什在竞选中谈到美国的海外驻军时认为,“这些使命必须符合国家利益”,“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全世界的利益”。^{[17](p14)}小布什政府一上台,便推出了与前任政府不同的外交政策。在中东问题上,美国一方面继续空袭伊拉克,另一方面对自2000年9月28日以来的巴以冲突熟视无睹,而且主动降低自己在巴以和解中的“和平调解人”的作用。对巴以冲突实施“超脱”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强调巴以双方在解决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老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倡导的“西促和谈”政策变得面目全非。美国新政府对中东和平实施“超脱”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因为中东失去了在美国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中东

的石油依然对美国具有较强的诱惑力,中东依然是美国推行其民主价值观的主要对象,但美国新政府对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巴以冲突产生了失落情绪。

在后冷战初期,巴以和平进程一度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中东实现了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在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杀后,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美国在中东巴以和平进程中的努力显得十分乏力,巴以和平进程在克林顿第二任期一度出现了反复,并最终倒退。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中东国家利益的局限性。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国家利益有了新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确保不会出现一个其政治及社会价值与美国的政治及社会价值发生严重敌对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保护那些分享美国政治原则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不受来自不与美国的政治原则和社会价值相分享的国家的威胁。”^{[18](p39)}这也是为什么在后冷战时期,美国虽然调整了中东政策,在“西促和谈”时对以色列给予必要的压制,而实质上仍然偏袒以色列的原因。如在召开马德里和会时,以色列要求不让联合国介入,美国为了安抚以色列,说“联合国的代表没有任何权威。他(假设这是一位男性代表)只能在会议厅的走廊上进行谈话,记录一下会谈情况,以便回去向秘书长汇报”。^{[14](p279)}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如此一味支持以色列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呢?“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出于我们的那些领导人——美国总统、国务卿官员和议员们的道义,我们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认为以色列就是美国的利益,但是对美国商人来说,也许他们并不认为约旦河西岸比波斯湾更重要”。^{[19](p445)}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支持以色列并不代表全美人民的利益而是少数人、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的利益。“一些权威学者认为,两亿七千万美国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取舍,实际上由几千人来决定”。^{[20](p1-2)}从这方面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在中东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在巴以和平进程中不可能绝对公正,而是以美国的利益为标准。“如果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已得到保证;如果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会伤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推动和平的热情就会大大降低。”^{[4](p5)}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巴以和平进程在取得重大突破后没有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后冷战时期,美以关系的变化对巴以和平进程有重要影响。在后冷战时期,巴以和平进程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而美国一贯坚持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使美以关系异常亲密。以色列不惧怕联合国

的制裁,因为那往往由于美国的否决而使制裁无法执行;以色列最害怕的是美国对其停止经济军事援助。如在马德里和会没有取得进展时,布什政府拒绝向以色列提供100亿美元的担保,使沙米尔政府在大选中落败。因此,考察这一时期的美以关系对理解为什么巴以和平进程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倒退有很大帮助。1992年,克林顿由于攻击布什总统对以色列的压制,赢得了美籍犹太利益集团的支持,在大选中淘汰了布什。在其执政以来由于与以色列工党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步调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美以关系超过了历届政府,巴以和平进程在美国的主导下向前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巴以和平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由于拉宾的被刺,虽然美国继续支持工党佩雷斯政府,工党还是在大选中落败。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逐渐在巴以和平进程上与美国疏离,但是又不能缺少美国的援助。随着美以关系的降温,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不仅仅是在接受施舍,而是与美国进行交易。以色列前国防部长依托克·英达伊说:“即使我只考虑以色列的空军力量,对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便宜的投资。我们有600架作战飞机,美国要保持这么多的机群,至少需要16艘航空母舰。”^{[19](p442)}1996年内塔尼亚胡上台时便称“以色列决不会用自己的利益去迎合美国的利益”,他的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政策,哪怕以同至关重要的盟国华盛顿的关系为代价也在所不惜。”^{[2](p109)}

这一方面说明了在近半个世纪内被扶植的以色列,在两国利益冲突的时候,已敢于向美国挑战了,必要的时候以“分手”相威胁,出现了小国“剥削”大国的情况,“为了解决小国合作意愿勉强的问题,大国可能给小国提供超过平均获益的份额”^{[21](p199)};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以关系已处在了后冷战时期的最低点。美以关系的变化,必然使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大大降低,这也就使这一时期的巴以和平进程出现了倒退。

第三,后冷战时期,大国的崛起构成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威胁。在冷战时期,英法等西欧国家及日本在一些战略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而到了后冷战时期,“盟国之间的关系通常变得更复杂,‘有条件’而不是相互一致。”^{[14](p23)}“西欧国家和日本出于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时而与美国保持一致,时而呈现自主独立倾向,与冷战时期唯美之命是从的做法截然不同。”^{[22](p1)}法国总统希拉克在1998年5月访问埃及前夕指出: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叙利亚有权收复戈兰高地,黎巴嫩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相应地以色列也应享有全面的安全。^[23]这是西方盟国第一个公开

提出建立巴勒斯坦国主张的领导人,这对坚决不承认与不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美国无疑是一个打击。德国在1996年“私自”调解阿以关系也遭到了美国的指责。日本由于资源缺乏,对中东石油资源依赖很大,随着90年代中期美日经济纠纷的爆发,日本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保持距离。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大部分“财产”,由于国力的衰弱,俄罗斯后冷战初期在中东问题上依附美国。但随着国内调整的完成,俄罗斯开始摆脱美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并认为“政治解决该地区冲突,不能只靠单纯的某一方面作出维和努力和为推动和平创造有利的条件”,并提出实现中东和平的几点建议。^[24]在1994年2月希伯伦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惨案爆发后,俄罗斯在安理会上谴责以色列,3月派出包括总统特使在内的高级官员访问中东,提出召开第二次马德里和会,以求打破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垄断,扩大自己的影响。

俄罗斯、日本以及欧盟国家对中东的积极介入,形成了与美国“多强一超”争夺中东的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构成了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美国在90年代后期霸权地位的削弱,使美国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推动巴以冲突的和平进程中去。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美国为了在海湾战争后进一步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并实现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实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政策,使巴以和平进程得以发展并取得重大突破,但随着拉宾的被刺、利库德集团上台,美国在尽可能维护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的情况下干预中东和平进程,并由于美以关系的变化,大国对中东的角逐,巴以和平进程开始了倒退与反复。随着2000年巴以冲突的升级,巴以和平进程显得遥远了,但无论是在巴以和平进程取得进展还是出现倒退与反复,我们都会发现这一切都是由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决定的。

2001年“9.11”事件以来,巴以关系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冲突。无论是中东和平路线图还是现在的以色列主动从加沙撤军,无不渗透着美国的利益因素,“确保该地区的石油、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及其来源,使美国在继续进行全面参与方面具有直接利益。”^{[25](p346)}

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巴以和平进程就有实现的希望。当前整个世界正日趋多极化。多极化的动态表明,霸权主义将日益缺乏施展的空间。美以关系仍将对巴以和解起着重要作用。当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关系超过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的利

益时,当以色列人民越来越厌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所造成的经济下降、社会动荡时,当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积极介入时,巴以和平进程必将迎来其灿烂的明天。

[参 考 文 献]

[1] 王逸舟. 国家利益再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2).
[2] 赵学功. 当代美国外交[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 洪兵. 剖析“美国利益”[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4] 赵国忠, 温伯友, 杨光. 1998- 1999 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5] [美] 威廉·富布赖特. 帝国的代价[M]. 简新芽, 龚乃绪, 李松林,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6] 邓鹏, 李小兵, 刘国力. 剪不断理还乱: 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7] 夏立平. 美国国会与中美安全体系——以台湾问题为例的分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3).
[8] 倪世雄, 刘永涛. 美国问题研究: 第一辑[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9] [美] 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 [M]. 东方晓,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0] 洪国起, 王晓德. 克林顿亚太政策受挫的文化因素[J]. 现代国际关系, 1995(5).
[11] 唐永胜. 角逐: 谁能占有先机——21 世纪初叶全球政治展望与中国的前景[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2] 赵国忠, 温伯友, 杨光. 1997- 1998 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13] 赵来文. 西方霸主梦——步履维艰的美利坚[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14] [美] 理查德·N. 哈斯. “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化战略[M]. 陈遥遥, 荣凌,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15] [美] 伊安·O. 莱斯. 21 世纪的政治冲突[M]. 张淑文,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16] 张士智, 赵慧杰. 美国中东关系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7] 潘锐. 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从老布什到小布什[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18] Irving Kristol, *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in Owen Harries (ed): *America's Purpose: New Visions of U. S. Foreign Policy*.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1.
[19] 徐向群, 余崇建. 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M].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4.
[20] Thomas R. Dye & Harmon Ieigler, *The Irony of Democracy: An Uncommo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10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21] [美] 大卫·A. 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M]. 肖欣容,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22] 金宜久, 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23] 巴勒斯坦有权建国[N]. 人民日报, 1998-05-29(6).
[24] 俄外长提出中东和平与安全准则[N]. 参考消息, 1997-11-02(2).
[25] [美] 查尔斯·库普乾. 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M]. 潘忠歧, 译. 上海: 人海人民出版社, 2004.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SA at the Beginning of Post-Cold War and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WANG Xin-guo¹, CAI Chang-zhuo²

(1. School of Social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Cold War came to an end unexpectedly, and America's opponents became so indefinable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defin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means not onl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the comparative impairment to its national strengt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ost-Cold War, the USA has been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volved in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Whether there is progress or retrogression in the peace process is determined by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Key words: the beginning of Post-Cold War; the USA; national interests;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

[责任编辑 刘文俊]